臺大歷史學報第 23 期
1999 年 6 月，頁 349-374

BIBLID1012-8514(1999)23p.349-374

宋代史學的特質及其影響

王 德 毅*

提 要

宋代是史學極盛的時代，不僅超越漢唐，而且凌駕元明，甚至清代史學亦有所不及。宋代史學的特質可述者有四：㈠博徵與考信。史學著作徵引浩博，體大思精，考證謹嚴，如司馬光修成《資治通鑑》，自為《考異》。㈡經世與義理。歷史在述人事，前代治亂足為今日之鑑戒。而人事之善惡是非尤賴辨明，方為對後世有益，故應重義理。㈢承舊與創新，承襲前代的編年體和紀傳體，並恢宏了編年史體，更進而創綱目體和紀事本末體。㈣貫古與通今，宋代史家長於考證古史，亦重通史，以求通古今之變，尤其對本朝史的纂修成就最偉。

宋代史學家強調正統，嚴於忠奸之辨，對後世史學精神之重視，倫理觀念之提升，極有貢獻。他們所創的新史體，更為元明清史學家所繼承。而對於其本朝史之纂修，元明清三朝之史學家都遠不如宋代。所以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史學發展史中，宋代史學的特質及其影響是最值得研究的。

關鍵詞：史學特質　徵信　資治　義理　編年　新史體　經世思想

* 作者現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宋代史學的特質
三、宋代史學的影響
四、結論

一、前言

史學是一門博大精深、包羅萬有的學問，雖然所陳述的是過去的人類活動，但其間之因承與延續，可以上溯往古，下逮累葉，與我們眼前的生活息息相關，是執政者應當獎勵去研究的。治國首重教化國民明禮、尚義、重廉、知恥，所謂「國於天地，必有以立，」如果四維不張，將何以立國呢？試問孔子爲什麼要修《春秋》呢？是因爲他感覺到周朝賴以立國的禮樂已經崩壞了，周天子已不再成爲天下的共主，就連魯國的國君之位恐怕也保不住了。憂懼的心情遂油然而生，乃綜述二百四十二年之世變，希望留給後世君子去回觀並取鑑。所謂「述往事，思來者。」其經世的精神至明且大，後世史家多欲效法孔子，紹繼《春秋》，於是經世思想遂成爲中國史學的傳統。

宋代是史學極盛的時代，朝廷設局修書，又獎勵士大夫修史，而士大夫亦視史學爲精深學問，與經學同樣重要。經是載道的，明經即在明道；史是載古今人事變遷的，人例有成敗賢不肖，國總有治亂興亡，這中間都必有其道，而此道亦多載在五經四書中，則史亦足以證明道之真實價值。天地間有萬事萬物，人與人間關係尤複雜，孰是孰非，何爲善何爲惡呢？人事變化無常，究竟要根據什麼來論斷善惡是非呢？這自然要根據歷史傳統來判斷。這傳統又要追溯到往古聖人所立之德，立之言，淵源流長，早已根植在國人之心中，積久而成爲真理，人人都可以根據良知良能作判斷。宋朝士大夫最重視春秋學，因爲《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際，」確定三綱五常之教，爲人與人間關係明定一個應守的準則，有權利也有義務，所謂「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否則便是君不君、臣不臣，天下就大亂了。宋儒從經史中探究這個道，所以一同研究經史，其順序爲先經而後史，含儲充沛，用之無窮。在十三經中，《論語》《孟子》尤其重要。如朱熹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

> 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個權衡，多爲所惑。[1]

先讀熟四書，使心中有個主宰，再去讀史，考古今治亂，研究典章制度，容易有創獲，評論人物善惡是非便不會失去中道，闡述治亂興亡之故便能極正大。隨著治經學者的崇尚新奇，不僅懷疑經書中有後人僞作，甚而刪改經文使之易讀易曉，[2]而史書的纂修與史事之論述，乃邁向一個嶄新的時代，成就之大是空前的，影響之遠也難以估量，本文之提出，旨在作初步的了解，並向海內外博雅君子請教，以匡不逮。

二、宋代史學的特質

甲、博徵與考信

宋代史家胸懷遠大，立志修史，便思超越前代史家，樹立新典範。乃博覽勤搜，積十數年或三四十年，而完成一部空前的鉅著。如司馬光（1019～1086）積十九年的歲月始修成《資治通鑑》，還徵選了三位得力的助手協同編輯，利用的古今載籍多達三百二十二種，融會貫通，看不出一點抄襲的痕跡來。始自戰國之初，終至五代之末，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爲書二百九十四卷，如此浩瀚的卷帙，還是前古所未有的。[3]蓋光整齊史料極謹慎，爲敘一事往往用數種出處萃成一段，足見其功力極深厚和投入的

1 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大化書局影印明成化覆宋刊本），卷5，〈讀書法〉下。

2 有關宋儒疑古毀經之學，可參看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大文史叢刊本，1980年）。

3 據紀昀，《四庫全書總目》（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武英殿刻本），卷47，〈資治通鑑提要〉云：「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爲前古之所未有。」其參據之書，據高似孫，《史略》（四明叢書本），卷4，〈通鑑參據書〉條開列二百四十七種。張須，《通鑑學》（臺灣開明書店印本），第3章詳列三百零一種參據書。1984年，陳光崇撰〈張氏通鑑學所列引用書目補正〉，收入劉乃和、宋衍申主編之《資治通鑑叢論》（鄭州：河南人民，1985）中，補列六十三種，而刪去張須所列書目中五種重複的，只剩有二百九十六種，兩者合計爲三百五十九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限心力。據晁說之（1059～1129）告訴友人王銍早年所聞諸司馬康的話，以見《通鑑》之成書絕不是偶然的。晁氏說：

> 子前日爲我言曰：「孰不知有《資治通鑑》哉？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有何邪？予於時坐不得安席，而欲起以拜子也。予早遊溫公之門，與公之子康公休締交義焉。公休嘗相告曰：「《資治通鑑》之成書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甫，自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純誠粹識，不懈晝夜，不時飲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幾有益於天下國家之大治亂，不自辜所志也。其在正史外而有以博約之，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朝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李延壽書雖無表志而可觀，《太清記》亦時有足採者。《建康實錄》猶檜而下無譏焉爾也。唐以來稗官野史暨夫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幸多存，而不敢少忽也。要是柳芳《唐曆》爲最可喜。」嗚呼，孰敢以佻心易談哉！[4]

這說明在完成修《資治通鑑》大業上，司馬光和劉攽（1023～1089）、劉恕（1032～1078）、范祖禹（1041～1098）是最好的組合，各以其專精的學問，純誠之心志奉獻於修書。三位助手都是極博學的，當時洛陽的唐代史料保存最多，范祖禹追隨司馬光遷居洛陽長達十五年，專以助修《通鑑》爲職，便完成唐代長編六百餘卷，其網羅史料之繁富便可想而知了。

司馬光所修的《通鑑》，不僅「遍觀舊史，旁採小說」，參用了各方面的材料，還要求其精當，使讀其書者了然這是一部信史，所以要下考證工作，特撰《通鑑考異》三十卷，說明何者當刪棄，何者應採擇，又有那些記載可以兩說並存，絕不是輕率下筆的。南宋學者員興宗在所上之〈資治通鑑策〉中曾論及之：

> 一說之眞，眾說之僞，眞僞相駁也。前志爲有，後志蔑焉，有無相蓋也。今一語伸其中，有無遂明，眞僞可了矣，此之謂考異也。……考異班、范而下字舛文誤，纖悉破碎，雖古史有彈誤者，有正俗者，有弼謬者，然自吾觀之不勝其煩也，今考異之書，辨同析異，其功自名

4 見晁說之，《嵩山文集》（四部叢刊續編本），卷17，〈送王性之序〉。

5 見員興宗，《九華集》（四庫全書本），卷11，〈資治通鑑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謂不細哉！[5]

有了這種細心的考證工作，使《資治通鑑》遂得傑然出乎眾史之上。司馬光已做了最好的示範，到南渡後，繼承光的李燾（1115～1184）修《續資治通鑑長編》，再繼李燾的編年史爲李心傳（1167～1244）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都是遵循光所創的義例。《續長編》記述北宋一祖八宗一百六十八年的史事，共九百八十卷，卷帙的浩瀚，史料的繁富都是空前的，而且用力四十年，這種有始有終的精神，更是值得崇敬的。在敘述史事後，遇到有爭議性的問題，或兩種以上記載有違異之處，皆做考異，如在《續長編》卷十七中辨《建隆遺事》一書並非王禹偁（954～1001）所作，便極獨到。其辨云：

> 世所傳《建隆遺事》十三章，此其第十一章也，事尤悖謬不可信。……臣燾嘗反覆推究此章，則普之怨家仇人（盧）多遊親黨所爲，欲肆其詆毀，故託名禹偁竄寄《遺事》中，實非禹偁作也。禹偁事太宗，坐直言屢出，故群小因之，然禹偁素識道理，忠義人也，決不敢鑿空駕虛，污蔑君父，若此不顧。……蓋禹偁用文章名天下，今所傳《遺事》語多鄙俗，略不似禹偁平日心聲，故臣燾竊有疑焉！特信其可信耳。學士大夫以書託名禹偁則遽信之，不復推究，此最害義者，故不可不辨。[6]

這很清楚的說明王禹偁平生爲人，不是一位反覆之徒，絕不會私撰不實的文字誇譽他人。這一辨証入情合理，可以看出李燾的史識與史德。今存《續長編》僅五百二十卷，爲清朝乾隆中修四庫全書輯自《永樂大典》者，徽、欽兩朝原爲三百五十七卷，早已散佚。神宗與哲宗之編年也有殘缺。茲就今存者觀之，其參據的私家撰述已極爲驚人，所以博徵之功是無庸贅言的。[7]

李心傳的《繫年要錄》二百卷，是接續李燾之《續長編》而作的，僅載述宋高宗一朝事，從其所附之考異中注明的參據史料觀之，經檢閱所及，已查出共徵引了一百三十多種專著，而諸家文集中所載的家傳、行狀、碑銘尚

6 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清光緒七年浙江書局刻本），卷17頁上。

7 參見拙撰，〈李燾評傳〉（收入《宋史研究集》，臺北：臺灣商務，1993年修訂本。）另外，裴汝誠等撰《續資治通鑑長編考略》（北京：中華，1985），其〈取材考略〉及〈注文考略〉敘述甚詳，亦可參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計算在內。其中有的考異陳述甚詳，徵引史料亦繁，案語尤極爲平實公正，如記紹興31年（1161）11月丁丑宋金采石戰役，下附之考異便多達六千七百字，引用九種私家史料，逐一擇述，並做了公正的研判。其綜評云：

> 臣嘗以眾說參考之，采石之役，若非虞允文身在兵間，激勵諸將，則將士潰亡之餘，將鳥奔獸散之不暇，使敵人一涉江，則大事去矣！《鞏亮錄》所書雖簡而盡，員興宗記載差詳。……王明清、熊克輩乃謂諸將已卻敵軍，而允文後至采石，不已誣乎！……趙甡之《遺史》雖詆允文爲多，然其指授諸將之功終不可沒。至謂敵出十七舟，每舟可載二十人，則亦未足據。金亮之來，其勢甚盛，若如甡之所云，是金人渡江之兵纔三百餘人，豈不兒戲！……大率紀事之體，抑揚予奪當盡其實，若少涉用情，則後之人有所不信矣！[8]

衡之以情，折之以理，驗之以事，固已極考証之能事。爲賢者辨誣，特指出敘事要理智，如稍涉及感情用事，那就難以令後人相信了。李心傳另著《舊聞証誤》十五卷，所辨正的多屬北宋的史事，偶有及於南宋初年之人物事跡者，則是《繫年要錄》中所未及的。其所用方法完全如司馬光的《通鑑考異》。「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廷制度沿革，下及歲月之參差，皆一一詳徵博引，以折衷其是非。」[9]如卷三引王明清《揮麈後錄》的記載，秦檜告訴方滋：他與莫儔同在金營中，儔曾向金元帥粘罕獻計，當取《玉牒簿》搜索宗室，他深不以爲然，因而說，宗族有親疏，平時疏屬並沒有分享富貴，今亦不當均分禍難。粘罕以檜言有理，從之，因此很看重秦檜。心傳根據《欽宗實錄》記載，靖康2年（1127）2月癸酉，金人在宗正寺取到宗室玉牒，即按名搜取，那時秦檜尚未出京，如何能表達不同意見呢？這純是秦檜回到南方後，常常誇耀自己的功德，以取悅宋高宗，是完全不足爲據的。

除司馬光、李燾、李心傳之著作外，鄭樵（1104～1162）撰《通志》二百卷，馬端臨（1254～1324）纂《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都是以精博見稱的。以考証爲主的則有吳縝的《新唐書糾繆》和《五代史纂誤》，雖其動機不純，頗有些吹毛求疵，然考証之功仍是不可沒的。甚至朱熹（1130～1200）、王應麟（1223～1296）之著作，博徵與考証兼而有之，

8 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194，頁15。

9 見李心傳，《舊聞證誤》（藕香零拾本），卷首所附四庫〈提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有傑出之貢獻。

乙、經世與義理

明末清初之大史學家王夫之（1619～1692）有言：「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爲來者師也。爲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乎史爲？」[10]這說明歷史的功能在垂鑑戒，讓後世子孫知道「善可爲法，惡可爲戒。」這就是司馬光爲什麼要修《資治通鑑》了。資治在說明治道之所在，求治要先了解教化的根源，都要從歷史中以探究之。南宋學者無不認同司馬光所強調的政治倫理和人際關係，將治亂的原因歸之於人君是否用賢德，大臣是否能從善。據林駉言：

> 昔神宗皇帝之敘《通鑑》曰：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蓋嘉其有關於風化也。孝宗皇帝之讀《通鑑》曰：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蓋稱其有益於治道也。……嘗謂是書以扶持風教論，不當以小小節目論。當以關切治道論，不當以區區凡例論。……公之所論者，凜凜乎君臣父子之經，三綱五常之理，仁義忠信之道，豈非有關於風教乎？……公之所論者，拳拳乎變更持守之異，拒諫從諫之別，私說正論之不相入，豈非有益於治道乎？[11]

此言振三綱，講人倫，重仁道，能如此必能長治久安，否則必至於亂。從整體看，《通鑑》的經世思想是完備的，有積極的一面，身爲一位師保之臣，使命感總是最強烈的。誠如呂中所言：

> 自昔師保之臣，未嘗不陳前代之得失，以爲人主鑑者。故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下至漢唐，進言者借秦爲喻，以隋爲監。自經筵之上，讀史讀治而不讀亂，故前車覆轍，後來並轡而不悟。國朝石介、范祖禹各有《唐鑑》，不若《通鑑》集一千七（三）百年之事爲備也。賜名曰《資治通鑑》，以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資其益於治道，通百代之龜鑑云耳！[12]

10 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四部備要本），卷6。

11 見林駉，《古今源流至論》（四庫全書本）前集，卷2，〈通鑑〉條。

12 見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文海出版社影印舊抄本），卷14，〈司馬光資治通鑑〉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是明鏡，修史者敘事必須謹嚴的明是非，別善惡，辨正邪，識忠奸，始能示以法戒，垂訓後世。春秋末年，孔子親見天下大亂，禮樂式微，「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非常憂恐，乃因魯史而修《春秋》，嚴於褒貶，使忠奸、賢不肖、善惡之跡無所隱逃，示天下不易之大法。程頤說的好：

> 夫子當周之末世，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13]

《春秋》爲經世之大法，義理之總匯，經世和義理是分不開的。治史不談義理，則大是大非不明，大賢大奸不分，大善大惡不辨，後世之人如何取法而爲戒呢？治之道安在，亂之故何由？均不了然，又如何奢談經世呢？是以宋代史家治史特重義理，且以繼承孔子《春秋》爲職志。如歐陽修所修的《五代史記》者是。據歐陽發所記〈先公事跡〉云：

> 先公既奉敕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文省而事備，（議者以謂公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本紀，立法精密，則又遷所不及也。）[14]

歐陽修用《春秋》之法修《新唐書》及《五代史》，褒忠善，貶奸惡，以求

13 見程頤，《河南程氏經說》（見里仁版《二程集》），卷4，〈春秋傳序〉。

14 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本）附錄五，歐陽發等述〈先公事跡〉。括弧內文字另參見朱熹，《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71，〈考歐陽文忠公事跡〉。熹因另見鄉人李氏所藏本，較新本文字有出入，特將刪去文字載入本考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合乎義理之公，警戒將來。南宋朱熹主修《通鑑綱目》，也是繼《春秋》而作，特強調蜀漢昭烈帝之正統，於褒貶尤嚴，明示爲人臣止於忠，忠就是不貳，臣如皆能忠君，必皆盡心治國理民，則天下太平可期。所以修史要嚴正，史的功能便可彰顯。如林駉說：

> 其爲《通鑑綱目》也，取溫公編年之書，律《春秋》紀事之法，一事之疑，若決蓍龜，一字之簡，凜乎斧鉞，別周末之僭王，明昭烈之正統，天下知其名分之嚴。揚子雲而係之以莽，狄仁傑而係之以周，天下知其護名節之重。綱舉而不紊，目張而不繁，其視司馬溫公異辭而同旨也。[15]

朱熹重名分，也即是重禮，與孔子、司馬光是一系相承的。爲人臣者，即使極有文才，如揚雄之流，先仕漢，繼而仕王莽，書其卒特冠以「莽大夫」三字。即使極有吏幹治劇之才，如狄仁傑者，既仕唐，復仕周（武則天），書其卒特冠以「周司空」三字。表示二人名節有虧。而不願爲五斗米折腰的陶潛，卒於宋文帝元嘉4年（427），特大書「晉處士」以褒之。這就是所謂之簡嚴，讓人耳目一新。所以褒貶不必太繁，關鍵的文字用對就夠了。

自歐陽修、司馬光以下，舉凡劉恕、范祖禹、胡寅（1098～1156）、李燾、洪邁（1123～1202）、徐夢莘（1126～1207）、袁樞（1131～1205）、王稱、李心傳等史家，無不將治亂的原因歸之於君主的用人，臣僚區分爲兩大類：君子與小人；君子守道行善爲忠臣，小人叛道作惡爲奸臣，王稱沉痛地指出：「夫忠臣進則朝廷尊，群陰用則禍亂作。」[16]這是造成靖康之難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南宋能夠中興，則是北宋歷朝仁厚之澤感發人心思宋的結果。徐夢莘編輯《三朝北盟會編》，志在究明國難之所由來，誤國奸臣罪大惡極，使國家民族遭受空前的浩劫。很多知識份子感時憤激，寫下一些見聞，大倡尊王攘夷，討賊復仇，夢莘匯集這些史料，編成一部書，專述內憂外患以警將來，並且要使「忠臣義士、亂臣賊子善惡之跡，萬世之下不得而淹沒。」[17]這正是民族主義史學。

---

15 見《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5，〈朱氏之學〉。

16 見王稱，《東都事略》（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宋刻本），卷11，〈徽宗紀〉附論。

17 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前附自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丙、承舊與創新

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先有後，用編年的史體修史是最方便的。所以說古史又曰編年，以年時月日繫事，詳於一代之治亂。至漢司馬遷修《史記》，創爲紀傳體，以人繫史事，詳於人物事蹟，甚受到後世史家的喜愛，著作日多，而編年史反而退居其次了。降及唐代，杜佑遵依《史記》八書和《漢書》十志類事分敘之體，修成《通典》兩百卷，專述自上古至唐天寶末歷代典章制度，最後特立〈邊防〉一門，分述四鄰的外族。《新唐書藝文志》卻將之歸入子部類書類，與北宋官修的《崇文總目》相同。不過總算是新創的一種史體了。[18]即就編年體而言，首先繼《春秋》、《左傳》的只有荀悅的《漢紀》，纔三十卷，僅述西漢一代之史，只是配合《漢書》而已，難以盡見治亂之本源。以後《後漢紀》、《晉紀》一仍舊慣。至宋司馬光修《資治通鑑》，雖用舊的編年史體，但卻別開生面，使編年史體振興起來。既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又能打破朝代的斷限，可以通觀十數個朝代的政治變遷，總結往古的政治經驗和教訓，對史學的貢獻就超絕很多，對後世的影響也就更深遠了。明焦竑說：

> 若《通鑑》一編，通群哲之歸趣，總百代之離詞，雖其涉津九流，鈐鍵六藝，而實王侯之龜鏡，經濟之淵奧也。[19]

其規模極宏偉，爲前古所沒有的。斷代的編年史病在私於一姓，《通鑑》則可以縱觀，梁啓超稱揚司馬光「其所經緯規制，確爲中古以降一大創作，故至今傳習之盛與《史》《漢》埒。」[20]是極爲恰當的。《通鑑》不僅內容精醇，受到士大夫的廣泛傳習，而且到南宋孝宗時，出現兩種新史體，都是因有《通鑑》而產生。一爲紀事本末體，一爲綱目體，都代表史學益興盛，歷史知識更能普及，配合政治上的需要或國家處境，孕育出一些新觀點，更能

18 梁啓超說：「紀傳體中有書志一門，蓋導源於《尚書》，而旨趣在專紀文物制度。……各史既斷代爲書，乃發生兩種困難，苟不追敘前代，則源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複取厭，……於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見《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臺灣中華），21。

19 見焦竑，《國史經籍志》（粵雅堂叢書本），卷3〈編年類〉所附之跋語。

20 見《中國歷史研究法》，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突顯史家的使命感。

紀事本末體是以歷史上所發生的大事爲核心，立爲標題，依年月日的順序，記述其事之發生、經過和結果，一大事件接一大事件的敘述，就把整個時代的歷史記載完備了。當然選取這些事件，並確立一個適切的篇名，編纂者自然有他的考量。此體始於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此書之成，有助於讀者了解時代的變遷，歷史上各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更有益於統治者以史爲鏡，法治戒亂，防微杜漸。當宋孝宗閱讀過此書後，爲之嘉嘆，並說：「治道盡在此矣。」還以嚴州印本賜給東宮和江上諸帥臣，告以要熟讀。[21]其受重視如此。袁樞在被召登對時，也以「偏聽奸佞，必致禍亂」爲諫諍，可說樞和司馬光的心志是相同的。楊萬里極稱揚此書能探病之源，並開出醫治之方。萬里說：

> 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嗟呼！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奸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無此書，近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户歟？[22]

袁樞的《通鑑本末》，道出「國家治亂之源，生民休戚之本」，不違背司馬光著書立說之旨，所以說是進入《通鑑》的戶牖。而且有了《通鑑紀事本末》以後，始有紀事本末體，與編年、紀傳鼎足而三，使歷史纂述之體更周備了。梁啓超對此新史體評價甚高，譽爲「新史的開山」。梁氏說：

> 紀傳體以人爲主，編年體以年爲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爲主。夫欲求史蹟之原因結果以爲鑑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爲主不可，故紀事本末體，於吾儕之理想的新史最爲相近，抑亦舊史界進化之極軌也。……樞書出後，明清兩代踵作頗多，然謹嚴精粹，亦未有能及樞者。[23]

這是極肯定袁樞開創新史體之貢獻的。

另一新史體爲綱目體，這是由朱熹主修《資治通鑑綱目》所開創的。利

21 見脫脫，《宋史》（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卷，389，〈袁樞傳〉。

22 見楊萬里，《誠齋集》（四部叢刊本），卷 78，〈通鑑本末序〉。

23 見《中國歷史研究法》，20～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司馬光《通鑑》中所載述之史事，敘事仍是用四繫之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不過是先用簡嚴的文字寫下所書之事，用大字標出，稱之曰綱。其下再用較繁文字說明此事，改爲小字細書，稱之曰目。綱爲《春秋》，目爲《左傳》。朱熹很留心書法，顯示褒貶，以表達嚴正的政治立場。其凡例稱：

> 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舉要，分注以備言。使夫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24]

繫年非常重要，所標舉之朝代、帝王和年號是爲正統的，熹頗不滿意司馬光述三國時代時用曹魏之年號，謂其意爲以魏爲帝，以蜀漢爲竊據。特爲改正，以昭烈帝章武元年接獻帝建安25年（220），指曹丕爲漢賊，謂真得義理之正，足以警戒亂臣賊子，以上繼孔子的《春秋》。於是有了綱目體，讀史者只要將綱瀏覽一過，就可以了解歷史大事，而且觀點正確，鑒誡昭著。

丁、貫古與通今

前述宋代史學家治史貴乎博徵，再作考証以返乎約，他們認爲古今是一貫的，研讀歷史不能只留意某一時期。司馬光撰《稽古錄》，上自伏羲氏，下迄宋英宗治平4年（1067），自共和以後編年敘事，內容雖簡略，然能貫古通今。光上表說：

> 由三晉開國迄於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爲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以來，對越神人，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憑依。總而成書，名爲《稽古錄》二十卷。[25]

昔孔子刪定古代的文獻而成《尚書》，是爲古代史。又用當時魯國史官的記錄修成《春秋》，爲現代史；也是貫古通今的。僅就光所修的《通鑑》而言，起於戰國之初，終於五代之末，包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也是一部精深博大的通史。在其同時，劉恕撰成《通鑑外紀》十卷，起於伏羲氏，迄於周威烈王 22 年（前 404），自共和以後，編年敘事，內容十分詳備。其下接

24 見《朱文公文集》，卷 75，〈資治通鑑綱目序〉。

25 見司馬光，《稽古錄》（四部叢刊本），前附〈進稽古錄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通鑑》，本來稱爲前紀。又自宋太祖建隆之元至英宗治平之末，司馬光編有《百官公卿表》十卷。劉恕亦有志修一較年表爲詳明的《通鑑》後編，終因身染重病而作罷，乃將前紀改爲《外紀》。否則，更能稱得上貫古又通今。

承繼司馬光欲爲編年的通史者則爲呂祖謙（1137～1181），他著有《大事記》，用司馬遷年表大事記之體例，原先的計劃是從周敬王 39 年（前481）編年始，至五代之末止。自淳熙7年（1180）正月開始編，一日編一年，採用《左傳》、邵雍《皇極經世》、司馬光《稽古錄》、《通鑑目錄》、《通鑑舉要曆》，以及歷代正史，又參稽諸子百家之言，輯而廣之，又撰通釋與解題以相配合。[26]不幸在次年2月得到不治之症，無法完成此一包有一千四百三十六年之通史，僅修到漢武帝征和3年（前90）而止，成《大事記》十二卷、《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嘉定5年（1212）刻於蘇州郡學。李大東跋其後云：

> 太史先生是書，名襲遷史，體備編年，包舉廣而興寄深，雖不幸絕筆於征和，而書法可概見。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通釋》是書之總也，《解題》是書之傳也。[27]

祖謙志在繼《春秋》，記事極簡明，於每一條之下皆注所參據之書，以示非己隨臆筆削，治史的態度是非常嚴謹的。朱熹甚爲推崇，一則說：「其書甚妙，考訂得仔細。」又說：「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功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卻煞有功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28]不過他卻有志於寫一部貫古通今的簡明通史。祖謙另撰《歷代制度詳說》凡十五卷，每卷一目，先述史實，再作詳說，史實取之歷代史志、《唐會要》、《五代會要》、《通典》，以及宋朝所修史籍和李燾《續長編》等書，自三代至北宋末各種制度變遷，皆扼要敘述，詳說則從義理觀點立論，尤留心於宋朝制度的檢討，其中論到南宋兵制，謂國家養八十萬軍隊，五十年不用兵，每年耗十分之八的歲入，乃至養兵之結果卻是：「則兵益弱而不可強，則財益竭而不可豐，癰疽之患，心

26 見呂祖謙，《東萊集》（續金華叢書本），卷6，〈大事記序〉。

27 見呂祖謙，《大事記．解題》（金華叢書本），末附〈李大東跋識〉。

28 見《朱子語類》，卷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腹之憂，以制吾國家之命者，是兵之爲也。踵末世之弊而不師古之過也。」[29]這是不能法漢唐盛世兵農合一之制造成的，宋朝已積重難返了。

南宋史學家頗重視通史的撰述，以鄭樵的《通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最傑出。鄭樵生長在閩南，家庭環境並不富有，但立志向學，從從兄鄭厚結廬夾漈山苦讀，寸陰未嘗虛度，雖「廚無煙火，而誦記不絕。」積學三十年，著成《通志》二百卷，起自三皇，終於隋朝，分類有六，紀十八卷，年譜四卷，略五十二卷，世家三卷，載記八卷，各類列傳一百一十五卷。他著書之旨重在會通，使古今可以貫通起來，以求了解相因之道。他在〈上宰相書〉中云：

> 天下之理不可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事不相因依。[30]

孔子集往古大成，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司馬遷修《史記》，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都是會通的。他之《通志》中的紀、傳兩體皆據歷代史之紀、傳而成，自三皇至隋朝而止。惟二十略則是他精研史學所獨得的，向下延敘至唐代，務在探因革之源。二十略中之禮、職官、選舉、食貨、刑法、天文、地理等是承襲歷代史志的，而氏族、七音、都邑、校讎、金石、圖譜和昆蟲草木等略，則是獨創的。所謂略，乃是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者，皆爲有用之實學，似可謂之學術文化史。[31]獨惜沒有修至北宋，則有賴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以補其缺憾了。《通考》也是從三皇敘起，下至宋寧宗嘉定17年（1224），已含有宋代二百六十五年，這是諸通史中包括的時代最長遠的。端臨修《通考》時，南宋已亡國二十多年，因爲其父廷鸞曾任宋朝宰相，國亡不仕，家藏典籍及宋朝文獻，父子相互討論，以探究歷代典章制度，積以歲月，完成三百四十八卷的巨著，在同類的著作中也是空前的。《通考》承繼《通典》，增其未備，補其缺遺，廣徵博引，最稱富贍。王壽衍的〈進文獻通考表〉中便提到：

>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總二十四類，其書與唐杜佑《通典》相

29 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說》（續金華叢書本），卷11，〈兵制詳說〉。

30 見鄭樵，《夾漈遺稿》（叢書集成本），卷3。

31 見鄭樵，《通志》（台灣商務印書館彙印十通本），卷首〈總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爲出入，杜書肇自隆古，以至唐之天寶，今馬氏所著，天寶以前者視杜氏加詳焉，天寶以後至宋寧宗者，又足以補杜氏之缺。[32]

如此，自遠古至宋寧宗四千年的典章制度就完備了。甚至清高宗也大讚特讚，有云：「朕惟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縱統同異，莫善於《通考》之書。其考覈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千年，貫穿二十五代，於制度張弛之跡，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燦然具備矣！」[33]所言極是。將《通鑑外紀》、《通鑑》、《續長編》、《繫年要錄》和劉時舉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合而觀之，自上古至宋寧宗之歷代興亡與治亂史就完備了。再配合《通考》所述的典章制度史，貫穿四千年之歷史始無遺憾。

三、宋代史學的影響

我國兩千多年間的諸史學大家，雖亦研究古代史，實則最關注的還是當代史，史事總是離的越近越重要。孔子修的《春秋》，距孔子最近了。司馬遷修《史記》特重漢興以後史事，班固的《漢書》及於王莽之誅，陳壽修成《三國志》時晉朝剛剛統一。宋代的史學家最重視現代史了，前述的李燾、李心傳、徐夢莘都是編修宋代史的名家，各有博大精深的著述傳世，留下豐富的史料，供後代史家修史時參據。其他如王稱、趙汝愚（1140～1196）、朱熹、杜大珪、彭百川、徐自明、陳均、黃震（1213～1280）、王應麟（1223～1296）諸家，都是重視當代史的，誠如梁啓超說的：

> 考証古史雖不失爲學問的一種，但以史學自任的人，對於和自己時代最接近的史事，資料較多，詢訪質証亦較便。不以其時做成幾部宏博翔實的書以貽後人，對於這個時代的史蹟永遠在迷離徜視中，又不知要費多少無謂之考証纔能得其眞相。[34]

依梁氏所言，宋朝的史家是最有貢獻的了，他們至少留下三部宏博翔實的大書給後人，今存的還有官修的《宋會要》，由北平圖書館影印的輯稿，爲清儒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仍多達兩百冊，保存的史料最豐富。其他

32 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十通本），卷首〈進文獻通考表〉。

33 同上書卷首〈御製重刻文獻通考序〉。

34 見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中華），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卷帙較少的編年史、紀傳史、詔令、奏議、職官、傳記等重要史書，還有二十多種傳世，散佚的更難統計了。梁氏認爲晚明的史家最有氣魄，就修明史而論，黃宗羲、萬斯同、潘檉章等人確有貢獻，但他們是受宋代史家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清代康熙以後，史學家皆專注於考古，其結果是博古而不通今。梁氏又云：

> 大抵自宋以後所謂史家—除司馬光、鄭樵、袁樞有別裁特識外，率歸於三派：其一派則如胡安國、歐陽修之徒，務爲簡單奧隱之文詞，行其谿刻隘澈之褒貶。其一派則蘇洵、蘇軾父子之徒，效縱橫家言，雌黃史蹟，以爲帖括之用。又其一派則如羅泌之徒之述古，李燾之徒之說今，惟斤斤浩博，不復審擇事實。此三派中分史學界七百餘年。[35]

這足以說明宋代史學對元、明及清初史學影響頗鉅。宋代史家著史方面廣闊而有深度，非盡如梁氏所言，如李燾修《續長編》，也是很留意審擇史實的。即使羅泌之《路史》敘事雖不免龐雜，然其〈國名紀〉「考証辨難語多精核，亦頗有祛惑持正之論。」[36]亦未可完全否定。另外，蘇轍（1039～1112）著有《古史》六十卷，自伏羲至秦始皇，所論亦多近理而可觀，並不是尚權謀的縱橫家言。[37]清初馬驌撰《繹史》一百六十卷，自三皇至秦末，蒐羅繁富，且有創新，仿袁樞的紀事本末體，每一事各立標題，詳述始末，其受宋代史學之影響是顯而易見的。[38]

再就宋代史學的創新而言，近千年的史學發展，幾乎都是宋朝史家開創後延續的。自司馬光《通鑑》傳世後，不僅南宋史家直接繼承，元、明、清史家再繼者亦有五人。元初金履祥（1232～1303）著《通鑑前編》十八卷，明王宗沐成《續資治通鑑》六十四卷，述宋元兩代；又薛應旂《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清初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元順帝至正 27 年（1367）。徐氏體例全遵依《通鑑》，有所論議用「臣乾學曰」以發之，比之於「臣光曰」。清中期畢沅（1730～1797）修《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迄於至正28年，乃後來居

35 同前書，271。

36 見《四庫全書總目》，卷 50，〈路史提要〉。

37 見《文獻通考》，卷 195。

38 見《四庫提要》，卷 49，〈繹史提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之作，頗受學林推重。錢大昕說：

> 編年之書，莫善於涑水（司馬光），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略北之病。乃博稽群書，考証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訖元，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另有考異附於本條之下。[39]

所言畢沅繼承司馬光修成《續通鑑》，使編年史更盛，所遺憾的是，當時學者罕治明史，沒有續編到明亡，直至清末夏燮著《明鑑》一百卷，專述有明一代，如今將《通鑑前編》、《通鑑》、《續通鑑》、《明鑑》四書合而觀之，四千數百年之編年史，就完全齊備了。

自元代以後，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之史書皆大量增加，可見承繼之盛。先言綱目體，首先繼朱熹的爲元陳桱，撰《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後二十二卷專述宋代史，宋末三王皆著其統，合乎朱子《綱目》之意。明成化年間，丘濬（1420～1495）著《世史正綱》三十二卷，只是史綱，並無目，但常在條敘史事後，依義理抒發議論，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始，至明太祖即位（前221～1368）止，書法本乎朱子《綱目》，頗重正統，於三國之世正名爲漢魏吳，用昭烈帝章武紀元，稱曹丕爲魏主，認爲如此纔合乎天地間萬世之綱常，明儒胡應麟極推崇之，譽爲宇宙間不可或缺之書。應麟說：

> 《通鑑》之後有朱氏之《綱目》，《綱目》之後有丘氏之《正綱》，三書皆宇宙間不可缺者。而《綱目》之異于《通鑑》，《正綱》之異于《綱目》，皆所以究于同而不足爲異也。[40]

說明這三部書都是爲維護綱常而纂著的，前後相繼，精神一貫。元金履祥撰《通鑑綱目前編》十六卷，明憲宗曾敕大學士彭時、戶部尚書商輅修《宋元資治通鑑綱目》，皆準《綱目》義例以纂修之，成書二十七卷。此後，南軒也編《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卷。清聖祖極重視這三部書，還作御批，其所批注，均以申天理，敦人情爲本。高宗又敕大學士張廷玉修《通鑑綱目三編》，專記明代。他在御製序中特推崇朱子，有云：

> 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鑑綱目》爲準。《通鑑綱

39 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四部叢刊本），卷42，〈兵部尚書畢公墓誌銘〉。

40 見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四庫全書本），卷101，〈讀世史正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目》蓋祖述《春秋》之義，雖取裁於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監戒、著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義，雖司馬氏有不能窺其藩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矣！……自《綱目》而成，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後儒有所依據。[41]

這又說明了朱熹的《通鑑綱目》不僅發揚了《春秋》精神，且使編年史體更加振興，甚至將史書中的義理觀念提昇到最高的層次，如沒有善惡是非之辨，只記載一些往事，是沒有價值的。高宗又敕傅恆別修《歷代通鑑輯覽》一百十六卷，起自伏羲，終於明崇禎17年（1644），凡四千五百五十九年，其「年經事緯提綱分目，一依朱子《綱目》書法。」乃是一部貫古通今之編年史，意在「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免蹈往日官修前代史「右本朝而左勝國」之弊。[42]事實上，修史之臣爲免被指爲不忠，對本朝仍多所頌揚，亦是合乎常情常理的。

朱熹修《綱目》的主要目的在強調正統，特別要表而出之的爲三國時代蜀漢的正統地位。這固然是受南宋偏安的影響，但堅持綱常，以爲蜀漢爲「正統之餘」，一個政權之存在是事實，不可因統地之狹小而抹殺，事實上，漢朝並沒有亡，又何必奪之太速呢？稍後蕭常本朱熹之旨，改編陳壽《三國志》爲《續後漢書》四十二卷，尊蜀漢爲正統，貶曹魏爲漢賊。周必大撰序說：「曹氏代漢，名禪實篡，特新莽之流亞。」[43]既然班固《漢書》稱王莽爲篡賊，則曹丕亦當爲篡賊，而《三國志》中稱丕爲帝，反而稱劉備爲蜀主，極不合乎天綱人紀，故特修《續後漢書》以繼范曄之《後漢書》，以昭烈帝繼獻帝之統。當時天下雖已三分，而漢統並未絕。朱熹此一史觀也影響到元明史學家，在蕭常之後所成之書，計有元郝經之《續後漢書》九十卷，張樞之《續後漢書》七十二卷；明吳尚儉之《續後漢書》六十卷，謝陛之《季漢書》五十六卷，皆是以正統予蜀漢，而斥責魏吳爲僭僞，認爲如此可以扶持名教，維護綱常。如郝經所言：「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

41 見《通鑑綱目三編》（四庫全書本）卷首。

42 見《歷代通鑑輯覽》（四庫全書本）卷首御製序及凡例。然編至崇禎朝，記清兵入關事，皆用「我大清」、「大清兵」，並抬頭高一格，以示尊崇，仍難免「右本朝而左勝國。」史臣爲表示忠於本朝，往往如此。

43 見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全集》（叢書集成三編本），卷53，〈續後漢書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蜀爲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僞。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44]乃本《綱目》義例而成《續後漢書》，意即扶持正統。此外，尚有元趙居信纂修的《蜀漢本末》，也是稟承朱熹《綱目》尊漢黜魏之旨，以見天道人心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明初曾刊行此書，方孝孺特撰序文冠其前以表彰之。序云：

> 當東漢之際，曹魏以蜮蟲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宇攘除奸凶之心，使漢室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黜，有功於人極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於後世。[45]

這也是受朱熹《綱目》的影響而完成的史學著述。自元以後，或編年，或紀傳，述及三國時代，皆以蜀漢爲正統，無疑都是服膺朱熹的。

再說紀事本末體，明清兩代史家用此體完成之史著特多，以斷代成書者則有明陳邦瞻之《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元史紀事本末》四卷，清李有棠之《遼史紀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紀事本末》五十二卷，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補遺六卷。以一書而爲紀者，則有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五十三卷。以一國或一偏霸之國爲紀者，則有張鑑之《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沈雲之《臺灣鄭氏本末》六卷，楊陸榮之《三藩紀事本末》四卷，亦可及於一地、一人、或一事，著作日繁，皆謂繼承袁樞。清初名臣傅以漸稱許其功能獨高，故能受到史家之喜愛。傅氏云：

---

44 見郝經，《續後漢書》（四庫全書本），卷首〈自序〉。

45 見方孝孺，《遜志齋集》（四部叢刊本），卷12，〈蜀漢本末序〉。案：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叢書集成新編本），卷2載：「趙居信《蜀漢本末》，三卷」，下注云：「字季明，許州人。翰林學士。」又《四庫提要》，卷50於〈別史存目〉亦著錄此書，據天一閣藏書本，謂：「前序一篇，不知誰作？」下所引序文字句則與方序相同，館臣失於查考，特爲表出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至有宋袁樞，紀事始著，自此以來，史體遂三分矣！夫考一代之統系，必在編年；尋一人之終始，必存序傳。……一事而散漫百年之中，一事而縱橫數人之手，斷非紀事不爲功。宜其書公卿樂得而爲討論，朝廷樂得而備顧問也。[46]

此一史體之產生，對近八百年史學發展之影響的確是很深遠的。

此外，鄭樵《通志》和馬端臨《文獻通考》也有開創之功，明中葉，邵經邦著《弘簡錄》，本來志在續《通典》，因爲不能續二十略，只成紀傳二百五十四卷。至清乾隆中，始敕撰《續通志》及《清朝通志》，皆有略。實則鄭樵二十略卻有崇高之學術價值，梁啓超認爲「自足以不朽，史學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慧星焉！」[47]至於《文獻通考》，則只是勤搜史料，精心整比，間亦陳述己見，較之二十略易爲。明萬曆中，王圻纂修《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其義例全仿馬氏，敘事自宋寧宗嘉定以後，至明萬曆初年，即圻修書之時代，時代是最近了，而且越近越詳，合乎宋代史家修史的傳統。至清乾隆中敕修《續文獻通考》及《清朝文獻通考》，民國初年，劉錦藻更修《清朝續文獻通考》，根本上是承繼馬氏，只是增加了外交、郵政、實業、憲政四考，乃因新政而略有所增，後代史家較易爲之，可見史書的纂修亦是因時制宜的。

最後要補述的是宋朝史籍種類繁多，開創面廣大，宋代史家所新編的史書，往往成了元明清史家繼起編輯同類書的典範，爲其本朝史留下極豐富的第一手史料。如杜大珪的《名臣碑傳琬琰集》，至有明徐紘繼之，而編《皇明名臣琬琰錄》，焦竑（1540～1620）進一步輯《國朝獻徵錄》，搜採極博。至清有錢儀吉之《碑傳集》及繆荃孫（1844～1917）之《續碑傳集》，體例皆本之杜大珪。據荃孫所撰之〈續碑傳集序〉說：

> 昔宋杜大珪撰《名臣碑傳集》一百七卷，收宋代名臣碑志遺事編次入書，以核其人之事功，以備國史之采擇，意至遠也。明徐紘撰《明名臣琬琰前後錄》五十四卷，王元撰《續錄》八卷。國朝錢衍石（儀吉）給諫亦成《碑傳集》百六十卷，一本大珪之例。[48]

---

46 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卷首傅以漸〈明史紀事本末序〉。

47 見《中國歷史研究法》，22。

48 見繆荃孫，《續碑傳集》（中文出版社業印本），卷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則荃孫輯成《續碑傳集》八十六卷，自然也是一系相承了。甚至到民國12年（1923）閔爾昌編《碑傳集補》六十一卷，27年汪兆鏞續成《碑傳集三編》五十卷，都是前規後隨的。

再如朱熹編《五朝、三朝名臣言行錄》，博採諸名臣家傳、行狀、墓碑、遺事，及諸筆記所載名臣前言往行，彙輯而成，也是一種新的史書。至元而有蘇天爵（1294～1352）的《國朝名臣事略》，明則有彭韶、徐咸、楊廉、沈應魁、汪國楠、李達機、劉廷元，凡七家，皆自言其繼朱子而作。楊廉撰〈皇明名臣言行錄識記〉云：

> 自朱子《宋名臣言行錄》，其後李幼武有《名臣續錄》，有《道學名臣錄》。又其後元好問有《金君臣言行錄》，蘇伯修（天爵）有《元名臣事略》，皆因朱子而興起焉！至國朝，彭文憲公（憲安、韶）《名臣贊錄》亦然。……若記事之書，取法於大儒，譬之爲圓用規，爲方用矩，何爲而不可哉？廉亦取法朱子者，故綴此以解人之惑云。[49]

繼朱熹編其本朝名臣言行錄的，尚不止於明儒，至清有王炳燮的《國朝名臣言行錄》，梁章鉅的《國朝臣工言行記》，其體例一本朱熹之先例。清康熙初年，崑山徐開任編有《明名臣言行錄》九十五卷，自明開國至南都，時明亡不久，也屬近代。無疑也是受朱子影響的。

四、結　論

宋代史學經三百年的發展，不斷精進，隨時有創新，開創面是非常廣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當然宋代史學的特點也絕不限於前述的四項。我於民國82年4月曾在本系所主辦的宋史教學研討會中發表〈宋代史學的教學〉一文，[50]提出：通史的重視，編年史體的興盛，史書中的義理觀念，歷史考証學的新風氣，以及史籍的廣泛，凡五項特點，今不願重複敘述，乃另立新目，作重點的補述。宋代史家對當代典章制度的用心編錄和考訂，對金石學的研究、類書的編纂和方志的纂修，都是爲前代史家所不及，而又開示後代

49　見楊廉，《皇明名臣言行錄》（明嘉靖棗刊本），卷首。

50　見《宋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大歷史系，1993），127～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軌則的，影響之深遠，亦未易估量。前述宋代所創的新史體，後代史家不斷繼承，這種影響是延續的。然就北南宋而言，南宋史學特別重要，史家貢獻亦獨多，近八百年的史學發展，都是由南宋領導著。前述元明史家僅追隨宋代史家之後，或編輯一些史料集，或續宋代史家已成之書，實在無法培育出偉大的史學家。民國以來研究史學史的學者多認爲元明「簡直沒有史家」。明代學者私修的當代史雖然不勝繁多，但其「編纂方法也只是因襲前代而無創新。因而在明代出版的史書中，竟難以找到自闢蹊徑，有自己獨創特點的作品。」[51]當然，明代史學的成就是絕比不上宋代了。再看看清代，初期史家皆爲明朝遺老，多懷有故國之思，留心明史，但在吳炎、潘檉章、戴名世明史獄案後，學者懼禍，而不敢再治明史，即清史亦少記述，乃轉而專治古代史之考証，故其僅博古而不通今。到了清季，外患日深，內亂又起，時空已有改變，清廷爲收人心，不再用語言文字羅織人罪，而史學者亦懷抱憂患意識，乃轉而研究邊疆史地和當代史事。甚至對南明的歷史也可討究了，弘光、永曆之年號亦可直書不諱，如陳鶴撰述的《明紀》和夏燮的《明通鑑》，應時撰成，用司馬光《通鑑》和李燾《續通鑑長編》體例，雜採諸野史，間作考異，其志以明亡爲鑑。當此之時，魏源撰《聖武記》，王之春撰《國朝柔遠記》，燮另撰《中西紀事》，皆用紀事本末體探討中英鴉片戰爭及以後之外患，儼然如南宋史家徐夢莘編輯《三朝北盟會編》。不過梁啓超還是很感慨地說：

> 清人不獨無清史專書，並其留給吾曹之史料亦極貧乏。……竊計自漢晉以來二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於清代者。蓋緣順康雍乾間文網太密，史獄屢起，……學者咸有戒心。乾嘉以後，上流人才，集精力於考古，……此種風氣及其心理，遺傳及於後輩，專喜摭拾殘編，不思創垂今錄。[52]

清代史家眾多，史學極盛，然極其精力於考古，而不能通今，這是清代史學比不上宋代的地方。

---

51 見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85），第四編第一章〈明代史學概述〉。又劉節，《中國史學史稿》（臺北：弘文館），在第15章中，總評明代史學，也說只有因沒有創。

52 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南宋以後，浙東史學漸漸興盛起來，浙東史家的共同點是留心事功，所研究的學問務必有助於經世。如章學誠說：

>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捨今而求古，捨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53]

浙東史學自南宋開始發展，到清朝初年臻於極盛，史學有了獨立的地位，不再以經領史。而史學之發展，既要承先，更要啓後，宋代史學家都做到了。今日治史學者，仍當效法宋代史家之治史精神，勤搜博徵、精密考証，立志修一部博大精深的通史或當代史，也好領導二十一世紀以後的中國史學。

附　記

尚有值得一提的是：當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以後，政府宣布對日寇長期抗戰，直到獲得最後勝利爲止。當時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遷到雲南，弦歌不輟。歷史系教授姚從吾倡議組織一委員會蒐輯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爭史料，乃草一計劃書，纂輯之體例就是仿傚李燾《長編》、徐夢莘《會編》和李心傳《要錄》，以盡國民一份子的責任。〈計劃書〉云：

> 作者平日涉獵國史，深覺宋代史家對當代史事的記述，最爲詳博可觀，而人人所稱道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因爲取捨有意，旨在資治，反不若李燾《續通鑑長編》的採輯豐富，註詳事盡。宋朝各個帝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史備事詳，尤超越今古，這時代大部頭的著作，若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的詳述外患，熊克《中興小曆》（四十卷）的詳記朝政，都是爲其他朝代所不及的；而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書，集眾史的大成，註詳文備，剪裁有法，尤爲有功於當代，遺實惠於後學。
>
> 歷史學的主旨，在瞭解現代事變之由來，記事能得眞象，應由近而及遠。前事不致妄解，則述今或更勝於稽古。今國難空前，殘破遍地，竊念應有比《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更詳備的蒐輯

53 見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國史研究室，1972），〈內篇〉二〈浙東學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與更詳備的記述。安慰當代的人，亦即告慰將來的人。（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幾將百年，尚無有如《三朝北盟會編》式的記載，博採中西記錄，以本國的立場詳述其事者，亦一憾事，是則蒐輯近百年來的中外記錄，亦應於戰事勝利以後及時注意。）[54]

結果由西南聯大與北平圖書館合作，共同蒐輯，至民國34年9月抗戰勝利而止，共蒐輯抗戰史料剪貼成冊者，計裝成兩百箱，運回北平，藏於北平圖書館，雖未出版專書，但蒐輯計劃是受宋代史學的影響是很顯然的。今日如修編年史，《長編》、《要錄》之編輯體例，仍是值得學習的。特附記於此，以紀念姚教授。

（責任編輯：王俊中　　校對：黃照明、陳祈安、朱開宇）

54 見《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爭史料蒐輯計劃書》，民國27年油印本，次年鉛字排印本。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ography in the Song Dynasty: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Wang, Teh-Yi

Abstract

The study of histor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rived to an extent unseen before and since. Among its special features are: (1) wide references and extensive textual research; (2) emphasis upon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s; (3)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tyles in history writing; (4) the construction of a general history. The historians in the Song period were devoted to a very wide varieties of subject matter, and very productive in their research, dwarfing historians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Even the historians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no match to their Song's predecessors, whether in historiographical research or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Keywords: Song Dynasty, Historiography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writ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